

中国古诗词的

女性隐喻与翻译研究

◎ 王方路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王方路 著

中国古诗词的
女性隐喻与翻译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诗词的女性隐喻与翻译研究 / 王方路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5

ISBN 978 - 7 - 5438 - 5222 - 8

I . 中... II . 王... III . ①古典诗歌 - 隐喻 - 文学研究 -
中国 ②古典诗歌 - 翻译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6051 号

责任编辑:李 林

装帧设计:黄 敏

中国古诗词的女性隐喻与翻译研究

王方路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神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000

ISBN 978 - 7 - 5438 - 5222 - 8

定价: 25.00 元

自序

美国《时代》周刊（2003/25）亚洲版的封面：中央是红色的、染有“非典”者的X光胸透照片，上面叠映着中国国旗标志五星，下面的黄色标题是“非典国家”。这是一幅渗透了历史偏见的、精心构思的封面。但是，这幅刺激我们自尊心的照片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严肃面对的问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形象站在世界的面前？它需要我们做出回答，尤其作为民族脊梁的知识分子，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是全面向西方看齐，或固守自己的疆界，还是立足于复兴中华之基，顺应全球性的潮流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新版帝国主义，它以“摇滚乐”似的狂热逗人。对全球化的系统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90年代以来达到了高潮。现在，“全球化”在世界各地似乎成了上层社会生活中最时髦的佐酒伴奏，下层人士莫名其妙。有关全球化的各种观点也陆续产生，它们试图从各种视角对全球化的概念、特征、内容、表现、后果和对策作系统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全球化理论。全球化活动是现实世界的一股寒流，风大浪也高。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家和学者共同的课题。本文将在后文概

述国际国内学者对于这个话题所表达的不同观点，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并试图探讨其在面临全球化大背景和文化全球性境遇时应当采取的正确立场。同时，以此作为本书的逻辑起点，在众生喧哗的全球化时代，作为研究翻译的中国学者，应当具有学术勇气，为构建中国译学，为中国学者在国际上争得发出声音的一席之地，也为解决汉诗英译实践作出绵薄之力。

一些严肃的欧美学者对全球化及其相关的理论课题作了探讨。阿里夫·德里克在对全球化做出基于后殖民理论视角的批判的同时，也抨击了欧洲中心主义。他（1998：1—42）指出，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世界也许会被重构，但是这种重构将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制度将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形式产生出构成其世界结构的不平等现象。查尔斯·洛克（1998：43—53）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名称。全球化无疑可以使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却会导致更多的人更加贫穷，因而会造成新的贫富等级差别。杜威·佛克马（1998：247—266）主要关注的是与全球化逆向发展的文化上的多元化。他的理论研究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人们广泛关注全球化的强力之时，不能忘了文化领域的新趋势。戴维·伯奇（1998：266—287）认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其不断发展的对各种本土势力抵制的关注。西蒙·杜林（1998：162）探讨了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在他看来，全球化缘起于传播媒介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传媒研究。这些外国学者的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下5点：（1）全球化是称霸与和平共处的斗争；（2）全球化是把丰富多彩的世界拴在一条链上，适应强势者的如意算盘；（3）文化广可包罗人间万象，狭可指一举一动，全球化实属天方夜谭；（4）全球化

引起的双向活动，一方面会出现血腥的天堂，一方面将陷进苦难的地狱；（5）头脑冷静的人，难免殷忧萦怀，苦寻出路。

国内学者对全球化这一热门话题各有独到的见解。最早中国的“全球化理论”见诸于王韬的“地球合一”说（王一川，2001：1 -4；15），王韬（1828 ~ 1897）认为当时的中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地球合一”时代，他还提出“地球合一”的两个层面：“道同”和“器同”，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支配作用。当代学者也积极投身于“全球化”的研究之中。王宁（1998：107 - 136）指出，全球化理论虽来自经济学和金融学界，但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文化全球化现象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论争而导致的一个结果。并同时指出文化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后果，前者指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从而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加紧密，后者指一部分精英文化和非市场文化产品的生产受阻，因而造成新的等级对立。张炯（1998：3）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向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趋向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吴元迈（1998：4）提出，我们需要对全球化现象做出具体辩证的分析，以便决定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因而绝对不可盲从，要对之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使全球化不至于破坏中国的文化特征。温铁军、黄平等（2001：3 - 12）通过对话的形式讨论了第三世界国家印度和中国所遭遇的全球化的影响，黄平（同上）指出，中国、印度还在继续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包括发展自己的经济和自己的国防，但是，由于资本、技术、信息、文化、人口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的跨国流动，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种体系实际上已经不是从前意义上的了，或者说它已经遭遇到了来自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而不只是来自其他民族国家（如所谓“列强”）

的挑战。姚洋（2002：71－79）在谈到全球化对我国村庄民主的影响时，主张“冷静的分析，而不是意气的发泄”。王一川（2002：3－8）倾向于用“全球化”一词专门表述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全球一体化，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全球一体化等；而用“全球性”（globality）一词专门描述在文化领域出现的全球各国之间相互参照、冲突、激励或共生等状况。从国际国内学者的论述来看，至少有两点可以达成共识：其一，在全球范围内确实存在经济信息接轨联通的局面，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语言的使用上。很多术语都是用英语来表述，英语成了学术、科技、外交、人员交往等方面的首要语言工具；其二，学者们在关注全球化的同时，也对文化的发展趋向特别给予关注。在此方面，笔者非常赞同王一川的观点，即在“全球性”境遇中参酌普遍性而创造独特性。

让我们先来看看文化这个词的含义，按照《辞海》的解释，文化有广狭之分。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成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伊格尔顿（2001：68）指出，文化这个字眼总显得既过于宽泛同时又过于狭窄，因而并不真的有用。它的美学含义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著述，但没有必要包括科幻小说；它的人类学意义则宽至从发型和餐饮习惯直到排水管的制造。在其动荡不定的概念史上，文化始终充当了文明的同义词和反义词，它始终在理想和现实的轴线之间摆动，同时也总是在描述和规范之间飘忽不定地徘徊。这同样说明，文化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的。本文所讨论的文化属于狭义的文化。如前所述，应当分别使用“全球化”和“全球性”来指称发生在

经济金融信息领域和文化领域出现的独特现象。因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现状以及信息发达程度的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是有统一的可能的，比如，我们用 GDP 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用 GNP 衡量国民生产总值，用 KM 表示距离，等等。更有甚者，欧洲国家还成立了欧元区，发行统一的货币。而在 INTERNET 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我们与世界各国的通信联系、信息交流也完全可以通过英语这种通用的媒介非常成功地进行下去。这一切我们可以用一个包罗万象的词来加以描述，这就是“全球化”。而反观世界各国的文化，我们发现，在此领域真可谓繁花似锦，异彩纷呈。正如王一川（2002：3）在《“全球性”境遇中的中国文学》一文里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全球性”主要涉及生活方式、价值体系、语言形态、审美趣味等文化维度，显示为时空模式、道器关系、传播媒介和审美范型四个层面。这几个层面在中国都已经发生深刻的转变，由过去的“中央帝国”“变”成了“地球”上的众多国家之一；“道为本器为末的关系”业已打破；机械印刷、电子媒介等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作为霸主的诗歌审美范型同样受到严峻挑战。这就很好地从一个角度论证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也正遭遇全球性的境遇，各个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参照。

王宁（2001：165－175）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文化和文学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其重要标志可以体现为中国文化在长期以来习惯性地形成的事实在上的“中心”地带——欧美国家的传播、发展和演变。这里至少关涉着 5 个事实：(1) 民族固有文化各有千秋；(2) 政治经济影响文化发展；(3) 物质方面的新兴文化是发达国家的强项，但精神方面的就不一样了；(4) 取长补短

一直是文化交流、文化影响的规律；(5) 在文化遭遇全球性境遇时，民族文化在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中显示生命活力，因而文化影响不会是单一方向，弱势与优势是变动的。董洪川(2001：23－29)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当代美国诗歌接受中国文化的深层原因。他首先指出当代美国诗歌大规模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然后，重点分析美国二战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美国诗歌在艾略特传统之后的发展状况，揭示了当代美国诗歌接受中国文化的内在必然性；同时指出，新诗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在美国的译介和传播，也是当代美国诗歌接受中国文化的重要语境。事实上，董先生此处言及的语境实为我们谓之的“全球性境遇”，这充分说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语境下，文化是不可能走向全球化的，各种文化只有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之上，吸收其他相邻文化的有益养料为我所用，才能使自身的文化永葆活力。于此，本文作者以为对中国当代青少年接受外国文化的趋势上，有必要通过合适的渠道加以正确引导，端正几个观点：首先，各种文化都有其自身优长，吸其长斥其短，既不盲目倨傲也不妄自菲薄；其次，生活、仪表以高尚、大方、和谐为好，炒作、猎奇、伤俗不好；第三，思想、情趣力求清新、健康、向上，避免狂暴或颓丧。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忧国忧民的传统，总是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涌现过孔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文天祥、严复、林纾、鲁迅、傅雷等许许多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创立学派教化普罗大众，或创作诗歌抒发胸中块垒，寄托爱国情怀，或译介外国文化作品启发民智，或兼事翻译创作促进文化沟通。这些群星璀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人物，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心系中华，忧国忧民。叶凯

(2001 : 40) 说：“虽然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提炼出许多人文学者所应具有的学术品质，如陈寅恪为王国维题写的碑铭中所说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作为一种评价人文学者的标准，但是当我们拿这种浓缩精华型的标准来比照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能够纳入这一尺度的知识分子少得可怜……”我们用这个标准衡量以上列举的代表人物会发现，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的，起码要坚贞不二，不辱祖国。在跨文化活动方面，他们能保持正确的立场，采取公正的视角。在这样一个跨文化的全球性境遇中，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建设中国文化的主力军，应当采取何种立场何种姿态？爱德华·赛义德（2001 : 9 - 11）提出，知识分子既要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又应当越过学术边界从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界，扩大自己的视野。这就表明，知识分子除了坚守自身的领地以外，还应当眼睛朝外，这里的“外”应该包括学界以外以及“外”来文化。高旭东（1986 : 57 - 60 ; 1993 : 115 - 120）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拜伦的《曼弗雷特》对鲁迅的作品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同时，鲁迅还和萧伯纳互相推崇。这又从另一角度说明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应当也能够采取一种包容和开阔的襟怀。在论述跨文化交际时，胡超（2001 : 53 - 55）指出，“天人合一”观既是中国诗性智慧，也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东方的高智慧象征。天人合一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沟通的最高境界，也是跨文化交际的最高境界。那么，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呢？同样需要相互容忍、相互关照、相互参酌的高姿态。从文化结构的角度来看，顾嘉祖（2002 : 45 - 48）提出观念是隐蔽文化层中的主要埋藏物，而观念的核心是价值系统，跨文化

交际研究应将挖掘隐蔽文化层作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这里虽然谈论的是跨文化交际研究层面的理论问题，但同样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结构，不同的价值体系，作为文化的建设者的知识分子必须担负起传播文化、交流文化的职责，通过接触了解不同的文化吸取不同文化的精华，达到建设自身民族独特文化的终极目的。而在理解和解析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学者也多有研究。刘佳林（2001：70）认为，知识分子作为普通的个体除了有与常人共同的缺点，也应该而且更应该具有常人的道德追求，否则其理论主张就缺乏说服力、感召力从而堕落成华美的道德谎言。这就是说他们应当知行合一。王培元（2001：148－150）通过介绍王富仁的随笔集《说说我自己》中探讨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人格建设的内容，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确立和拥有一种“公民意识”；我们应该也必须站起来行走；我们不能被边缘化；我们得像其他民族知识分子一样，独立地追求一个神圣的目标。关于这一点，索飒与迪特里奇（2002）的对话可以对之加以很好的印证。他们的对话探讨了全球（尤其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思想上的危机，并提出复苏批判精神的必要性。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说，置身于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遭遇全球性境遇的大语境下，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中国知识分子所肩负的责任极其重大，一方面，他们应当采取一种开放的、包容的、跨文化的学术姿态。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中，要“在消除话语对抗中获得话语对话的新空间”（王岳川，2001：1）；在对待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传媒的功能方面，也应当认识到，电影、电视和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呈一种互动和互补的关系，因为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多

元的”（王宁，2001：3）。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应该完全融进或被别的文化所同化。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应当具有独特的个性，这就是继承传统知识分子具有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心系中华、忧国忧民的独特品格，同时也要摈弃那种将文化生产当作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的观点，要力求对社会、对文化建设做出具有推进作用的努力。为此，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学会并不断提高在各种环境下乘风破浪的本领。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幅登载于美国《时代》周刊上的封面图片，它没有摆脱“东方主义”思维的羁绊。正如爱德华·赛义德在建构“东方主义”的同时所强调指出的：……我的确切论点是，东方主义是——但不只是表现了现代政治—知识文化的某个方面，而且其本身与其说与东方有关倒不如说与“我们”的这个世界有关（王宁，1995：8）。这就是说，所谓的“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人出于对广大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处于该神话中的东方，总是和肮脏、落后、愚昧、疾病相伴而生，因此，所谓的 SARSNATION 完全是对中国带有东方主义式的偏见。而为了消除这种偏见“回敬”诸多歧视甚至敌视的文化异军，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应不辱使命，以自身的独特个性为本，加上跨文化的姿态置身于文化全球性境遇之中，加强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繁荣中国文化，达到闳富多姿，声色俱茂。任他聪明儿爱恋，聋瞽叟垂涎去。

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在全球化的经济金融大背景下、在全球性的文化境遇里，中国知识分子应不辱使命，以自身的独特个性为本，加上跨文化的姿态置身于文化全球性境遇之中，加强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繁荣中国文化，达到闳富多姿，声色俱茂；应该拿出一点学术勇气，建立自己的学派，提

出自己的理论，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复兴中华文明、重拾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综观坊间，有关翻译的著述，荦荦大观。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其一，国外的著述，极少有提及外译汉或者汉译外者。他们要么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阴魂萦绕，压根儿就没有把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放在心上，压根儿就没有把长达至少两千年的中国翻译史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翻译理论和具体的翻译实践纳入其研究视野。这无疑是国外翻译研究的一大阙如。其二，国内的著述，除了少数有点儿民族自信心、有点儿学术勇气的学者（如许渊冲先生）外，大多是“言必称希腊”。他们要么是对中华传统文明知之甚少，从而，不敢提炼出自己的理论；要么就是民族自信心不足，他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因此，满嘴的洋腔洋调。正如张经浩（2006：5）先生正确指出的那样，“现在，谈外国翻译理论的文章表面热闹，但实际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搬运，因为这些文章基本上属于对外国翻译理论的介绍和推崇。我们应该清醒看到，当外国理论的搬运工不可能有所作为。有的学者说要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但是试想，搬运工怎么可能与生产者同等地位？怎么可能进行平等对话？”

张先生（同上）还指出：原来我国的译家只有对翻译的零星论述，但现在有的译家既从事大量翻译实践，又有成套理论（不是搬运外国的，而是原创性的理论）。最典型的是许渊冲先生。许先生从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中总结出了“三美论”、“三化论”、“三之论”、“文化竞赛论”，这些理论都是前人未有的，也是国外没有的。许渊冲先生近20年出版译作60部，理论专著5部，既是杰出的翻译家，也是有独到见解的翻译理论家。这样从自己翻译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翻译理论的人物外国译界有否，还未见热衷于外国翻译理论的人介绍。

故此，本书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斗胆提出作者本人的观点，无论贻笑大方，还是觅到知音；无论应者寥寥，还是好评如潮，那都是读者自己的事。这也正如张经浩先生所呼吁的：“以研究中国的传统和经验为主，以外国的理论为辅，这才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应回归的正道。”本书分为理论篇、实践篇和附录部分。理论篇将论述外国主要的翻译理论、国内文学诗歌翻译研究，提出中国古诗词中存在女性隐喻的观点。实践篇将分成五章，具体对应五个方面的女性隐喻范畴，涉及诗歌原文，译文，解析，旨在说明女性隐喻现象对译诗的影响，欣赏译文时对女性隐喻应当加以关注。附录部分将收录本书作者部分诗歌及其译文（均由作者本人译出）。之所以附上这部分内容，是为了凸现作者本人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实践努力。

本自序部分内容曾发表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本书简介

中国文学史中有一个传统，用美人与爱情故事隐喻诗人的内心活动与政治抱负和理想世界。中国文学肇始之初，诗人们就已多方采用妇女和爱情来宣泄真实心境和对现实的不满。此后这方面，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不少佳话佳作，诸如爱情圆缺、仕途得失、寒秋扼腕、春意凝望、爱恨煎迫，总有一个牵动人心的丰满女性。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的现象？原因在于，古代社会，包括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等级观念无处不在。在社会生活中，女人从属于男人，而男人则从属于统治集团。因此，（男）诗人们常常扮演女性形象以抒胸中块垒，而不直露，避免伤雅失礼。本书作者认为，我们在将此类诗歌翻译成外语时，首先应当认识到它们的典型特征，即，女性隐喻；其次，应当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即，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译者的女性身份以及女性审美心理。唯此才能传达原诗及诗人的本意。

作者简介

王方路，男，1968 年生，重庆市梁平人，文学硕士，副教授，中华诗词家联谊会终身会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终身会员。一直致力于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研究，已发表论文、译文 30 篇。其中：《文化内涵与跨文化交际——文学翻译中的跨文化视角》（《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类核心）学术论集（2002）；《英语混成词例释》（《中国科技翻译》，1995/1 外语类核心）；《全球性境遇里中国知识分子的跨文化姿态与独特个性》（《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6 外语类核心）；《外贸函电特点与翻译刍议》（《中国科技翻译》2005/1 外语类核心）；《国内实用文体翻译研究综述》（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1 人文社科核心）。已发表的理论性译文有《新世纪的新鲜事》（《中国科技翻译》，2003/3 外语类核心）；此外，在 IEEE Medicine and Biology Magazine 上发表理论性译文四篇（1996a, 1996b, 1997, 2003）。参加国际性及全国学术会议八次。主研省部级科研课题两项。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博士课程班在读博士生。

目录

自序 (1)

理论篇

第一章 国外翻译研究扫描	(3)
1. 1 语言学及其相关层面翻译研究	(3)
1. 2 文化视角的翻译研究	(6)
1. 3 解构主义及其他翻译研究	(10)
第二章 国内诗歌翻译研究要览	(24)
2. 1 古籍翻译	(24)
2. 2 古诗翻译	(25)
2. 3 译诗之意义踪迹	(27)
2. 4 汉诗英译之移情	(29)
2. 5 诗歌隐喻共项	(32)
2. 6 诗歌、隐喻与翻译	(34)
第三章 许渊冲翻译思想略论	(42)
3. 1 许渊冲早期翻译思想	(42)
3. 1. 1 三美论	(42)
3. 1. 2 三化论	(43)
3. 1. 3 三之论	(43)
3. 1. 4 三势论	(44)
3. 1. 5 三似论	(44)